

语言符号学

编者按:符号学是索绪尔开创,皮尔士、莫里斯等人发展,将语言符号视为其核心研究对象的学科。从前,人们受共时语言学思想影响,大多考察静态符号及其体系。而今,人们将符号主体——人、主体行为——解释和时间纳入符号考察视野,于是研究符号本真存在方式的动态符号学就成为符号学的发展标志。本期刊发的文章都是动态符号学框架中的研究成果。董丽云博士从艾柯的解释学思想切入,以创造和约束为对象,揭示动态符号的特征,尤其是解释问题。顾嘉祖先生从谜米学的崛起初步建构动态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孙秀丽博士和李增先生则从理论渊源出发,阐释克里斯蒂娃动态符号学思想。三篇文章不仅不约而同地研究动态符号学,而且共同凸显语言研究的发展趋势:学界的关注焦点由低层级向高层级转移,语篇/文本已经成为符号学、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重点。

创造与约束 ——论艾柯的阐释观

董丽云

(福建师范大学,福州 350007)

提 要:艾柯主张文本的阐释具有开放与有界、创造与约束并存的性质,其阐释观中关于阐释约束性的思想在充斥着各种后现代阐释观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艾柯在不同的思想发展时期强调了文本阐释的两个不同方面。前期,他凸显文本阐释的创造性;后期,则关注文本阐释的约束性。这两个阶段的阐释思想与他独特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艾柯创造阐释观中的“无限的符号过程”和约束阐释观中的类本质主义思想又与神秘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艾柯;创造;约束;文本意图;神秘主义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8)01-0108-6

Creation and Curb

—On Eco's Hermeneutic Thoughts

Dong Li-yu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Eco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is characterized with creation and curb, especially the latter which has been attached much more importance in the modern society. However, different aspect of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emphasized in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firstly the creation and later the curb, both of which have been based on his philosophic thoughts.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to the mysticism which has somewhat been related with creation and curb of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because of the endless semiosis and quasi-essentialism respectively.

Key words: Eco; creation; curb; textual intention; mysticism

国内对于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意大利)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上述方面。然而,作为与理查德·罗蒂、乔纳森·卡勒以及克利斯蒂娜·布鲁克斯齐名的当代阐释学大师,作为上世纪那场“阐释学世纪之辩”——“丹纳讲座”的主角,艾柯的学术影响更在于其深刻的阐释学思想。

因此,进一步了解与把握艾柯的阐释学思想及其发展,对于掌握西方阐释学思想的新动向,弥补国内在这方面的缺失,并在阐释实践中帮助我们反思作者、读者和文本的关系,判断文本阐释的可能性及阐释的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艾柯的阐释学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玫瑰

之名 备忘录》(Reflections on the Name of the Rose, 1984)、《诠释的界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1990)、《诠释与过度诠释》这三本著作中。艾柯在其阐释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分别强调了阐释的两个不同方面:阐释的创造性与约束性。前期的艾柯提倡作品,尤其是文艺作品的无限开放性。如在《开放的作品》和《读者的作用》两部著作中,艾柯就肯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被他视为开放作品的范例(筱原资明 2001: 54)。后期的艾柯则更突出阐释的约束性,在《阐释的限度》和《误读》等著作中,特别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艾柯反思了“阐释的无限可能”这一极度自信的观点,认为虽然作品是开放的,但对它的阐释仍然受到约束。这两个阶段的主要观点与艾柯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联系。艾柯创造阐释观中的“无限的符号过程”和约束阐释观中的类本质主义思想与神秘主义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正是这种联系使得上述两种看似矛盾的理论得以融洽地糅合在艾柯的阐释学思想中。

1 阐释的创造性

文本阐释的多样性早在中世纪的阐释方法论当中就曾大量涉及,如对但丁《神曲》的阐释就呈现出多样性。此后的阐释学研究也多半从美学角度出发,即主要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而艾柯对阐释的创造性则主要从符号学角度出发。众所周知,艾柯是符号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符号学理论实现了从索绪尔向皮尔士的过渡,并最终完成了以理性、分析性、逻辑性见长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艾柯称自己的符号学理论是“关于谎言的理论”：“不能用于谎言的不能说是符号,符号的宇宙首先是谎言的宇宙”(艾柯 1990: 45)。用“无中生有”来形容艾柯的符号学理论是很恰当的,因为被认为符号所指的客体未必需要现实上的确定存在。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艾柯综合读者、符号过程和文化意义三个方面的研究,阐明文本阐释多样性的哲学基础,从而对文艺和美学现象进行更准确的说明。

1.1 读者的作用

符号总是有读者对象的,而读者在艾柯阐释思想中享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艾柯的“开放文本”的观念与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文本自足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这对企图抽离出文本最深层结构的结构主义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

战。他们拒斥艾柯“激进”的观点并且提出,文本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固定的性质和结构。对此,艾柯针锋相对地指出,作品的结构不能框定文本的意义,读者在阐释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艾柯举例指出:英国警方10日称近日挫败一起企图炸毁飞机的阴谋,并在伦敦逮捕了数名涉嫌策划爆炸事件的恐怖分子。据英国《卫报》报道,恐怖分子试图在10架英国航班上安装炸弹。英国内政大臣约翰·里德表示,恐怖分子的上述行动如果得逞的话,可能造成平民“史无前例”的伤亡。英国警方相信,恐怖分子计划在手提行李中藏入炸弹,将爆炸装置偷偷运上飞机,然后在这些航班上同时启动爆炸。目前,英国警方已经逮捕了21名涉嫌参与恐怖袭击者。(http://post.baidu.com/?kz=122461967)在这则新闻中,具有不同经验的读者在阐释时可能冻结或放大的新闻点是不一样的。英国政府可能会为这次反恐成功而洋洋得意,而恐怖组织则会为这次反恐的失败大为光火;英国政府的关注点是如何挫败恐怖组织的阴谋,而一般的英国公民的关注点是可能伤亡人数的多少……由于读者的主体经验各异,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因此投入的情感也不一样,这都给文本的多样性解读带来了契机。读者是文本意义生成的最后也是最为积极的一环,这一观点的提出使艾柯成了意义专制主义的掘墓人。

1.2 符号过程理论:解释项和试推法

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分为符号过程理论和文化意义理论。艾柯从皮尔士的符号学中汲取精华,并且找到“开放”的符号论的源头。解释项和试推法是艾柯从皮尔士那里借用过来并加以发挥的催化剂,使得符号产生过程富于创造性和灵活性,因此成为艾柯符号过程理论的基本内容。

皮尔士把符号、对象和解释项看成符号过程的三个主要因素,符号的对象相当于“某物”,所谓解释项,以“代替”这一关系为媒介。艾柯批评皮尔士对解释项的定位过于生硬,因为皮尔士的解释项必须有一个“软着陆点”——实体的存在。相对而言,艾柯对解释项的功能定位要丰富和广泛得多。艾柯认为符号学理论是用来说谎的理论,不存在的客体也可以进行解释。解释项具有记号、指号、定义、情绪联想(引申意指)和直接意指等多种功用,并且可以超越符号内的规则,说明、展开和解释任意符号。简单说来,如果要明确所谓符号的解释项是什么,就必须用另外的符号指明。并且,这个符号还要通过另外符号来指明,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直至无穷。这种解释项概念

也由此成为艾柯文化符号世界中无限引申意义现象的基础。

解释项的无限符号过程遵循的是试推法。皮尔士把试推法视为与演绎法、归纳法、假定法和假设法等相同的对举项,其大意为“形成一般预测的科学方法”(李幼蒸 1993: 533),因此被归入广义逻辑学的范围。但是艾柯把“试推法”创造性地纳入符号学,并且强调试推法与演绎法、归纳法不同。但笔者认为,如果说皮尔士的试推法归入逻辑学的范围过于宽泛,近似勉强,那么艾柯的试推法已经不能归入逻辑学范围,充其量是一种准逻辑,因为艾柯的试推法“依据的是文化约定,是对意指规则系统的试探性和冒险性地追溯,此系统使符号获得意义”(李幼蒸 1993: 536)。

尽管艾柯赋予符号解释项和试推法以逻辑的外衣,但它们仍处于无限变动之中。正是这两个动力学观念为文本阐释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1.3 文化意义理论

艾柯创造阐释观的符号学基础还体现在他的文化意义理论中。艾柯把整个文化体系比喻成一个由众多相互牵扯的弹子组成的箱子,这种“牵扯关系”就是艾柯所谓的“代码”,艾柯形象地称之为“磁化”。“磁化反应”是由社会习惯规定的暂时状态,这种关系不是僵死的,它是一种差异关系,是代码在文化体系中差别的体现。文化体系中的“磁化”关系,就意义而言,犹如“百科全书”式的复杂。“百科全书”与“字典”相对。“字典”是意义的结晶体,而没有任何延伸和牵扯的空间,它有着极强的组织结构的意义空间模式;与此相反,“百科全书”式的意义世界就是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组织,其结果肯定较“字典的意义世界”更加梦幻多变,更加神秘莫测。但是对于艾柯来说,“在相对于意义的历史性变化而言,它是灵活的,明显有对立,矛盾和多义的重复印记这一点上,可以说更符合它(“百科全书”式的意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筱原资明 2001: 89)。

如上所述,由于阐释主体的变化,符号过程的动态化加之“百科全书”式的意义世界的繁复,阐释成为一种探索性行为,这就使阐释有了不确定性,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阐释的创造性和创造性的阐释才是可能的。然而,阐释又受到作品本身固有结构的约束,正如今道友信所说,“艺术品具有一定的结构,即它常常是被限定的东西。这种限定,比起对单一事物的限定,要远为复杂而精致。艺术品因为受到那种限定而成为艺术品。人不遵守这一限定时,必然产生拙劣的作品,从欣

赏的角度看,当超过限定时,会作出错误的解释”(今道友信 1987: 55)。

2 阐释的约束性

艾柯与罗蒂在剑桥大学“丹纳讲座”上关于阐释是否有约束的论辩可谓“世纪辩论”。辩论中艾柯不遗余力地论证这样一个观点:文本的意义不应无休止地漂流和不尽地繁衍,文本阐释是受约束的。艾柯担心会出现过于泛滥的文本阐释现象,试图对文本阐释的范围进行限定和说明,以证明某些阐释超出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从而成为过度阐释。艾柯认为,“作者意图”、“标准读者”和“文本意图”都会为文本阐释设定一定的限制,正是这些因素框定作用,限制文本阐释的可能性范围,超出这一范围的阐释就成了过度阐释。

2.1 作者意图

虽然把“作者意图”看成文本阐释中约束因素之一犹如冒天下之大不韪,艾柯还是勇敢而技巧地肯定“作者意图”在文本阐释中的地位:经验作者必须被授予某种特权,将某些阐释摒弃在“合法阐释”之外(林斌 2004: 34)。这无疑给文本阐释设置了一个较为宽泛的界限。

艾柯认为“作者向演奏者、解释者、听众提供了一部有待完成的作品”(艾柯 2005: 48),并且通过文本提出许多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尽管不是所有的)正是由作者合理地组织、定向和赋予的,可供正当展开的诸种规定性。而且,有些阐释是作者所期望的、激发的,并在其预先限定的范围之内,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在作者发动起来的美学机器预先限定的范围之内,正是这架机器指引受众。从这一点说,这既是作者意图给文本阐释带来创造性的一面,也是给文本阐释带来制约的一面。

2.2 标准读者和文本意图

在艾柯看来,除了“作者意图”这个限制外,一定还存在着某种更为重要的对阐释进行限定的标准。

艾柯在《读者的作用》这部著作中提出“标准读者”这个概念,以区别经验读者概念,其大意为原著所想定的读者,是作者假设“与他共享相同代码的一群可能性的读者”(Umberto Eco 1984: 7)。艾柯的“标准读者”概念是针对解构主义的激进阅读理论而提出的,用以说明文本与读者之间的某种辩证关系,但是“标准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具有怎样的规定性这一问题,在艾柯的论述中仍然缺乏具体规定;加之,艾柯当时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读者对文本阐释的创造性研究上,所以在某

种程度上,他的“标准读者”概念仍然是某种理论设定,是经验读者的理想模型,是对读者阐释主动性的一个制约。但我们不难看出,艾柯这里的“与他共享相同代码的一群可能性的读者”,多少类似于共同体这一概念,这一共同体由于某种历史文化原因,至少能够理解特定文本的组织结构和文本所谈论的话题。艾柯在另外一些地方或多或少地肯定我们的这一猜测(艾柯 1997: 160)。在此后的“丹纳讲座”上,艾柯提出“文本意图”这个概念。“文本意图”是文本本身所隐含的意图,是“根据文本的连贯性及其原初意义生成系统来判断,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是否就是文本接受者根据自身的期待系统而发现的东西”(艾柯 1997: 89)。它既不同于前文本“作者意图”,也不同于结构主义的拒绝读者的“文本深层结构”,更不同于众口难调的“读者意图”。“文本中作者”潜意识甚至“集体/个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阅读中读者主体意识的自由介入分别对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向构成了干扰因素,而文本的稳定状态决定了文本意图的可靠性,使之成为给作品定性的唯一标准。”(林斌 2004: 48)“文本意图”是艾柯对“标准读者”概念的一个补丁。艾柯此时指出“标准读者”是对“文本意图”进行正确揣测的读者,是能够以“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文本”的读者(艾柯 1997: 89)。可见,艾柯此时以稍加详细的方式提出文本阐释如何受到约束。

在艾柯看来,“以文本应该阅读的方式去阅读文本”的体现之一就是文化历史语境的参照,这是“文本意图”的一部分。虽然《开放的作品》是艾柯的第一阶段的作品,这一阶段主要突出艾柯阐释思想中开放的一面,但是对这部作品进行评论的雷纳托·巴里利却隐约地看到艾柯文本思想里光辉的另一面,即阐释不是毫无约束的自由之物,文化语境是阐释的参照物,这一点是始终流淌在他思想的血液里。雷纳托·巴里利指出,“艾柯受到这样一种方法的影响……这种方法将其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形式、材料的组织方式、结构模式和使材料具有秩序的方式上”(艾柯 2005: 9)。而且,艾柯在《诠释和过度诠释》中指出“阐释文本”与“使用文本”之间的区别时认为,虽然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目的,如戏仿,自由地根据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使用”华兹华斯的诗歌文本,但倘若要“阐释”华兹华斯的诗歌文本,就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比如,艾柯指出,对 *a poet could not but be gay* 中 *gay* 的理解,敏锐而有责任心的读者并没有义务去猜测华兹华斯

在写这句话时头脑中到底在想些什么,但他却有责任考虑华兹华斯时代语言系统的基本状况。在那个时代,*gay*这个词还没有任何“性”的内涵。“承认这一点意味着认同从作品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相互作用的角度去对作品进行分析”(艾柯 1997: 83)。从语用学角度说,文化语境限定阐释的范围,这一点是大部分理论家所公认的。这个限定十分宽泛。既然如此,“文本意图”在具体的阐释实践中又有着其他怎样的约束作用呢?艾柯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所谓的“文本意图”就是“以文本应该阅读的方式去阅读”,这种说法十分模糊,因为任何人也不能断定自己的阐释就是某种恰如其分的阐释。每个读者都可以说自己按照文本应该阅读的方式找到了“文本意图”,自己就是文本的“标准读者”。这样,一个类似维特根斯坦悖论的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人人都是“标准读者”,就根本不存在“标准读者”;如果个个都是“文本意图”,也就不存在“文本意图”。

此外,“文本意图”概念容易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质疑。首先,既然“文本意图”由语言共同体决定,而语言共同体又是先于阐释的存在,是一个先验的视域,那么读者的阐释都应该是有效的。如此,过度无效的阐释又是如何跳出这个先验视域而产生的呢?其次,有人认为,由于“文本意图”的不确定性,过度阐释仍然是难以界定的。艾柯建立的语义场是历史文化演变的产物,因此有些人认为即使有一种公众的阐释或者说集体的时代阐释成为标准阐释,也很难保证它在今后不会成为过度阐释。

尽管如此,这种顾虑似乎既有点多余,又有“偷换概念”之嫌。艾柯的“文本意图”只是为文本的阐释设界,它并不是不顾忌历史文化语境,而且企图在历时层面上一劳永逸地为文本阐释找到确定的阐释。首先,“过度”就是相对于“度”而言的,对于文本阐释来讲,“度”是一个历史概念,“度”在哪儿,“过度”自然在那儿,所以“过度”永远建立在“度”的基础上。由于“度”是一个历史概念,因此“过度”也自然是一个历史概念。其次,这个质疑是对文本阐释的界限问题和意义的确定性问题的混淆。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各种阐释能否得到永久承认的问题,依赖于对文本阐释界限问题的探讨;前者的解决不完全依赖于后者的解决,即如果意义确定,那文本阐释的界限存在毋庸置疑;如果意义不确定,文本阐释的界限依然可能存在,文本阐释仍有可能趋向一致。反过来,如果文本阐释不会趋向一致,那么意义则

不确定;如果文本阐释趋向一致,意义是否确定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艾柯和罗蒂悬置并逾越意义是否确定这一难题,只讨论文本阐释是否有界,这正是他们的明智之处。也就是说,艾柯和罗蒂争论的新异之处在于,他们的争论已经不在一个“点”上,而是扩展开来,把论辩的触角延伸到尽管文本阐释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阐释是否有界,即是否趋向一致的问题。对意义确定性问题的回避可以使他们避免跌入这个古老问题的漩涡中。

3 艾柯的创造和约束阐释观

创造与约束构成了阐释的两面,没有约束,就没有创造。两者的统一可以从多个角度得到论证。例如,两位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和利科从现象学角度分别论述理念意义和个别意义、意向意义和指向意义两者的辩证关系,从而把阐释的创造与约束统一起来。饶有趣味的是,艾柯创造与约束的阐释观是通过神秘主义思想而统一起来的。

艾柯认为,就阐释而言,总的说来存在着互为消长的两条路径:一条是理性主义的,另外一条是非理性主义的。当一条路径显得十分突出的时候,另外一条路径依然如影相随。这是因为这两条路径都受到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

神秘主义起源于希腊神话的技艺之父赫尔姆斯。赫尔姆斯是易变、多义的象征。在关于赫尔姆斯的神话中,赫尔姆斯能够超越空间界限,改变音貌形态并同时出现于各种各样的场合。我们可以看到神秘主义对同一律、矛盾律及排中律的否定,因果关系呈螺旋状地卷曲着,所以“后”变成“前”,“因”变成“果”。非理性阐释派的无尽演绎的思想也因此与神秘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艾柯在论辩当中把罗蒂的阐释思想溯源至非理性的神秘主义,认为神秘主义阐释者可以在文本中发现无穷无尽的联系。在他们看来,不存在文本阐释的约束,更不存在不连贯的文本,读者的建构能力是一根魔法棒,能够把零星的感兴趣的点串联起来,构成前后一致的整体。这只是神秘主义的一个方面,是一种去除了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被除去了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是自由漂浮主义。随着形而上学和双重世界的二元论的终结,此时的神秘主义,没有绝对知识或绝对的实在也能获得完全的快乐。”(唐·库比特 2005: 6)

3.1 无限的符号过程

当艾柯找到攻击对手的有利证据而感到欣慰并且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却发现神秘主义竟然也出没在艾柯的思想里。艾柯主张文本阐释具有

创造性,他的符号学思想中的“无限的符号过程”露出他创造性阐释观的神秘主义尾巴。

艾柯主要通过解释项和试推法反对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意义的确定论。解释项是无限滚动的符号过程的意义载体,“可相当于内容的任何编码的涵义,即相当于整个记号载体的直接意指和引申意指的领域”(李幼蒸 1993: 533)。它是一种观念性意义,尤其是一种引申性意义。于是,任何意义本身都可作为进一步意义的记号或推出另一个意义的基础。艾柯的符号解释项使能指互相指涉行为得到长足的发挥空间,只要通过普遍的联系这一看似符合逻辑的行为,就可以把触角延伸到意义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皮尔士的试推法是一种推论逻辑,而艾柯的符号学试推法由社会性代码决定,是符号因果性观念的结果,于是试推法成了艾柯编织“百科全书”式的意义世界的神秘武器。但李幼蒸指出,艾柯所指的“因果意指关系不过是按结果模式加以约定的结果”(李幼蒸 1993: 537),即与逻辑的推理过程无关,所以试推法的这一淡漠逻辑的特征极大地便利了符号游戏过程,因此解释项在试推法的这个“永动机”推动下,意义空前增殖。

根本上说,神秘主义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是反理性,反逻辑思维的,它是关于现象间普遍存在神秘联系的学说。正是由于解释项和试推法概念的存在,符号的产生过程成了一个忽视逻辑推理的无限倒退过程,艾柯的创造性阐释观也由此走向了无限倒退的神秘主义。

3.2 类本质主义的思想

然而,以上只是神秘主义表现的一种形式而已。神秘主义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它具有可望而不可及的终极目标。在神秘主义那里,解释的无限性和“秘密的捍卫”其实是不可分割的。真理只作为深层的不可谈论的东西而存在,并且,探寻如此隐藏的真理的解释唯有无穷无尽地继续下去。艾柯的阐释学思想也有着这种神秘主义表现,但是这正是对深层结构的无限着迷,至少是一种类本质主义思想。这样,艾柯阐释学思想中的神秘主义与类本质主义就纠缠在一起。

柯里尼在为《诠释和过度诠释》作序时指出,艾柯与罗蒂在阐释思想上的分歧,不仅来自文化范式由一元到多元的转变中产生的一系列的后继反应,而且也是神秘主义思潮的不同形式在死灰复燃后的斗争。一方面是对索绪尔的能指极度发挥,结果是文本意义无休止的漂流;另一方面索绪尔的能指任意性与结构主义“追求深层结构”的

思想的结合,使能指有了追求终极所指目标(“本质后面的本质”)的推动力,使得“这种寻找深层结构与模式的作法与被重新激活了的,对人类活动可能性进行超验探询的‘后康德主义’遗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对意义,对沟通以及其他类似主题进行深入精细探讨的非常抽象的普遍性理论的产生”(艾柯 1997: 8)。

艾柯为了给文本阐释设界提出“文本意图”之说,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文本的连贯性及其原初意义的生成系统进行阐释,从而在文本中发现文本所要表达的东西。在这里,艾柯并没有明确规定“文本意图”;为了不至于让“文本意图”与结构主义“文本自足论”中的本质论混为一谈,艾柯再一次提出,文学文本的目的就在于产生它的“标准读者”——按照文本的要求,以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文本的读者。“文本意图”也好,“标准读者”也好,艾柯并没有对此作具体说明,都是阐释过程中的理想模型和理论设定。然而,正是在“文本意图”、“标准读者”甚至“标准作者”的“鼓舞”下,阐释不是无水之源,无木之本。为了防止意义过度,“文本意图”和“标准读者”就成了阐释中读者应当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

罗蒂的批评也说明一些问题。他指出,“意义就是使用”,不应将文本的使用和文本阐释区分开来。他认为,艾柯对这两者的区分是建立在如下前提下:文学文本具有某种本质,对文本的合法阐释就是以某种方式去发掘,阐明那个本质。

从根本上说,这两种神秘主义并没有不同,都是无限倒退的过程。类本质主义的思想只是被一股形而上学的冲动所驱动,而不断通过螺旋的曲线企图达到“希望之乡”,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地否定自身,结果还是走向无限倒退的神秘主义。艾柯创造和约束的阐释正是通过神秘主义无限倒退的形而上学冲动体现出来,它的进步之处源于其符号学思想和类本质主义思想,但是偏颇之处同样源于这两者,因为试图折衷的艾柯始终没有跳离神秘主义思想的纠缠,始终徘徊于具有理性和非理性主义双重身份的理论困境。

4 结束语

在众多的阐释观点中,艾柯开放有界的文本阐释思想因其折衷、温和而广为接受。艾柯的广义文化符号学思想为其文本阐释开放性的思想提

供了系统的哲学基础,但是他完全放弃了指称,把意义看成由解释项通过试推法在文化价值体系中的体现。但是这种看法未免太宽泛了:无限的符号过程必然走向神秘主义。

就艾柯阐释约束性思想而言,艾柯提出的“文本意图”犹如“隔靴搔痒”,他未能鲜明描述“文本意图”,也未能明确说明“文本意图”本身是否能够被描述。但尽管如此,艾柯还是指出“文本意图”的获得由语言共同体的语言宝库决定,它是约束阐释的机制,其进步意义在于他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文本阐释约束的存在:约束由语言共同体决定。但艾柯并没有进一步解决的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语言共同体如何约束文本阐释。也就是说,文本阐释约束在语言共同体中以何种方式被通达?这是认识论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未能解决,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批评就是:如果按照艾柯所说,文本应该“按照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则人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按照“原文应该阅读的方式去阅读”,人人都可以声称自己发现了“文本意图”,成为了“标准读者”。于是,悖论产生了:个个是“文本意图”,就不存在“文本意图”;人人是“标准读者”,就无所谓“标准读者”。

参考文献

- 艾柯. 符号学理论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艾柯等. 诠释与过度诠释 [M]. 北京:三联书店, 1997.
- 艾柯. 开放的作品 [M].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 今道友信. 存在主义美学 [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林斌. 文本“过度阐释”及其历史语境分析——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反犹倾向”谈起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4(4).
- 唐·库比特. 后现代神秘主义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筱原资明. 埃柯——符号的时空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Umberto Eco.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